

允晨叢刊 39

讀史的樂趣

李弘祺著



讀史的樂趣／李弘祺著，-- 初版，-- 臺北市
：允晨文化，民 80
面； 公分，--（允晨叢刊； 39）
ISBN 957-9027-46-3（平裝）

1. 史學-講文,講詞等

607

80003887

1207
1

讀史的樂趣

李弘祺著

ISBN 957-9027-46-3

獻給

我的老師們

在你的殿宇裡一天，
勝過在別處住上千日。

——「詩篇」第八十四篇

目錄

序 9

一、思考近代：中國的與西方的

「現代性」的歷史意義——近代西方世界形成的一些省思 18

近代歐洲思想與變遷的觀念——談鮑瑪教授及其新作：《近代歐洲思想》 33

追求現代中國——史景遷論近四百年來的中國 52

芸芸衆生的歷史——談布勞德和他的新書 67

另一種鄉愁——思想的理智與民族感情的直覺 77

二、思考歷史

史學研究前景的我觀：方法及視野的一些反省 108

西洋史學史論 131

學習歷史應該研讀史學名著 156

泛論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意義——附論從筆記、劄記到社會史 180

沈潛與高明之間——美國歷史學會會長聘克尼教授訪問記 225

三、中國史與世界史

世界史眼光看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中西交通史與比較世界史 242

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年代 274

評最近出版三本有關中國通史的著作 284

四、讀史的樂趣：預言、造假、暴力與回憶

德日進著《人的現象》淺述 314

穿過「奴才歷史」的迷霧——把希特勒還原到歷史裡去 345

革命就是暴力——談夏瑪的《公民們》 358

七房橋的世界——介紹鄧爾麟教授論錢穆的新書 375

清澈晶瑩圓融合一的智慧世界——紀念錢穆先生 388

銘謝 401

序

一九七四年我寫完耶魯的歷史博士論文，就到香港中文大學教書，第二年取得學位，開始教學和研究的生涯。十七年來，除了在宋代教育及科舉方面寫了許多論文及兩本書之外，我一直關心一個更廣泛的問題：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如何使近代世界的價值與中國歷史經驗所發展出來的價值結合起來的這個問題。十七年來，圍繞著這個問題，不覺也寫了不少文章。現在把一些我認為寫得比較好的編集在一起，題為《讀史的樂趣》，算是對這一階段努力作一次反省和紀念。

中國的近代化問題圍繞了近百年多少中國知識份子。談這問題的已經太多。所以我從來不直接討論它。我一直相信，近代化固然不是西方化，更當然不能是「有中國特色」的欲迎還拒的，裹小脚的近代化。近代化就是面向世界。

面向世界是一個不容易的課題，不是可以輕易處理的。其中一個方向是要深入地反省中國的知識傳統，並思考支持這個傳統的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太多中國人寧願作知識分子，但太少人肯當學者了。世界太過複雜，面向世界是嚴謹的工作和使命。因此我們對於世界和

世界史必須有一種根本的求知的決心，用最嚴肅的態度去瞭解它——知識分子的熱情和著急必須輔以學者不旁鶩而深沈內斂的努力，這樣才能作現代的格義，談分辨中西文化的是非短長，而使中國人的生命價值和近代世界人的生命價值真正合契而交流，交互爲用，相輔相成。

本著這樣的信心，在教研之際，我一直努力閱讀及寫作有關近代世界（特別是歐洲）歷史的書籍。我深深接受十九世紀以來流行的「知識不外是歷史」的看法。這種看法其實早在十八世紀就由章學誠的「六經皆史」一語道破。在我這本集子中，讀者很容易看到我所宗信的歷史學的信念，以及我所主張歷史是一門獨立學問的看法。當然，十多年的思索使我已經又漸漸回來相信歷史或人文科學的知識，其根本也仍必須建構在理性上面，因此是和自然科學相通的。這一點我在討論梁漱溟先生思想時（一九八七年）第一次作了發揮，比起我較早的文章（如一九七七年的「泛論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意義」），這中間當然有了重要的改變。

但是從求知的立場來說，要瞭解人和他的文化，那便必須從歷史開始，這是無可否認的。在中國知識傳統裡頭，這個想法也是理所當然，勿庸多述的命題。但更進一步的是如諾瓦里斯(Novalis)所說：「所有的歷史都是世界史」——若想要瞭解一個國家或文化的歷史，那便也應該把那一個歷史放在世界史的脈絡裡去瞭解。我這種想法受到麥耐爾(William H. McNeill)、布勞德(Fernand Braudel)等人的影響，在這本書中再三申述。因爲我所主張的

「面向世界」，它最根本的信仰正就是因為我們只有在世界的網絡裡才能看清自己」。

「歷史便是世界史」大致上可以有下面三種意義：首先，沒有一個文化可以不借用其他文化的發明或影響而獨立發展的。提倡「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命題就是希望學者會不斷地檢討中外文化交流的內容和過程。布勞德和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作品中經常讓我們看到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它們所能激引的興奮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輕易領略的，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瞭解我們自己的文化對於全人類作出的貢獻，也可以讓我們知道世界上其他的文化又如何幫助我們摸索出今天我們所習以為常的生命價值和生活的習慣。

我在「世界史眼光看中西交通與文化交流」一文中介紹了中西文化交流歷史裡比較重要的研究成果。我很希望日後的研究能不限於物質文明的交流，而進入諸如思想、教育、價值的交流和相互影響，好對人類文化的基本關懷作出釐清和深刻瞭解的貢獻。

這就帶我們進入「歷史便是世界史」的第二重意義。比較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對於一些歷史上的難題有另一種向度，而往往是發前人所未發的瞭解。但雖然我們都同意比較歷史很重要，但迄今卻仍沒有什麼完善的方法讓我們真正可以進入這個領域。我個人在思索這個問題時，也不時感到苦惱得很。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歷史家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畢竟還很有

限，而這麼大的課題當然不是假一人之力可以在短期間作出系統的貢獻的。

但我認為學者絕對不可以輕易放棄這方面的努力。只要我們能擴大視野，廣泛閱讀，那麼當我們再回來看自己的文化時，一定有許多值得我們鼓舞的新見解。

例如余英時在解釋章學誠對「道」的說法時便顯然曾借用了黑格爾的思想。這樣子的例子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也有很多。學者若能活用由比較歷史得到的靈感，那麼就能收羚羊掛角的功效，學術研究也因而更為令人興奮，而更具說服力。

在這本書中，讀者到處可以看到我借用由世界史的訓練所獲取的眼光來處理中國歷史的例子。梁漱溟建基於反「理性」（狹義）思想的狹窄民族主義適可與十九世紀德國反啓蒙思想及與之聯在一起的浪漫風格的民族主義相比擬。近代中國史學史中，方法學上的由考據而歸納而探研歷史之發展軌跡的這個發展也可與西洋從十七世紀以來由通儒(erudite)的方法而臻於分析的史學發展相比擬。相同地，在「中國歷史上的偉大年代」中，從「士人社會」、「中外文化交流」及「工業發展」的角度來思索中國歷史，它顯然地反映了我對「近代性」價值的瞭解和關心。

從一個更具體的立場言之，那麼比較世界史也便是比較中國史。西方學者對中國史的研究不免帶有由其本身立場所形成的特殊關心。這些關心有時候卻又具有普世性的向度。史景

遷(Jonathan D. Spence)強調近四百年中國的苦難歷史，其歷程雖然十分悲壯，但到頭來中國卻不能算是「現代」(modern)國家，因為中國人無法超越自己的歷史。我認為這個說法實在如晨鐘暮鼓，切中啓發，是中國知識份子所應細心思索的見解。

我所寫評史景遷《追求現代中國》的文章，或如「評最近出版三本有關中國通史的著作」，乃至於「七房橋的世界」等，都是介紹性的書評，目的是要介紹西方中國史研究的名著。我的根本信念十分簡單，即中國史是人類共同歷史或文化的一部份，因此我們必須瞭解不是中國人所寫的中國史的觀點，庶幾可以看出在世界史發展過程中中國史的地位和角色。

我上面所舉的三個方向大略可以作為「歷史即世界史」的注釋。要真正對「中國史與世界史」的命題作出有意義的貢獻，那麼我們便必須對世界史有一種投入和追求瞭解的決心，廣泛閱讀，與時並進。

因此只要有機會我總是會把西方史學中最新流行的名著加以介紹。像麥耐爾或布勞德，這些都是成名已久的重要史學家。其他如近年來崛起的夏瑪(Simon Schama)，教我西洋思想的鮑瑪(Franklin L. Baumer)，一九八〇年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的聘克尼(David Pinkney)等人，我也寫有專文介紹他們的書或訪問他們。嚴格言之，他們對史學的瞭解及寫作方法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並不具備相通的見解或線索，但是我還是把他們收集在一起，好凸

顯閱讀歷史的興趣。「西洋史學史論」一文基本上也反映了相同的關心。

質是之故，這本書也收入了我還在大讀書時所寫的介紹德日進(Teilhard de Chardin)的文章。德日進是屬於喜歡獨立思考，談宇宙人生的深入哲理的科學家，他的重要性就是把帶有「時間」向度的演化理論放入了基督教思想裡頭，好為傳統基督教裡頭關於「人的獨特性」及「神(上帝)的救贖計劃」賦以新義。他的影響不在於史學界，而在於神學、哲學及科學界。鑽研現代物理學而必須思索宇宙起源的學者往往對德日進這本《人的現象》感到十分新奇，認為可以汲取靈感。另一方面，由於他把大自然演化的過程和人類的歷史視為一個過程，因此就讓現代談生態及保護自然的人找到一種理論上的寄託。因此我還是把這篇文章收在這裡，提供給喜歡從思考歷史大問題中找尋樂趣的人一個比較意外欣喜的機會。

我對人類全體歷史的關心以及我要把中國史提升到世界史的興趣似乎會使得我書中所收兩篇有關錢賓四先生的文章顯得有點意外。過去十多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的經歷可以說是「一段與錢先生「共舞」的歷鍊過程。我用的「共舞」取的是最近流行電影「與狼共舞」(Dance With The Wolf)的意思。錢先生那種近似吉柯德(Quixote)式的文化民族主義充滿了浪漫的情懷，似乎必須回到那個與現在世界隔絕的「七房橋」才能重拾其溫馨。但是我認為他所宣示信念卻又顯出無限的清澈和渾融，這便使我相信他的思想若能從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的

網絡中提出來，放在人類共同享有的真善美價值裡去定位，那麼他那抽象化了的至理必然又會與我這本書許多其他文章所宣示的信念是相通的。

當然，如黃黎洲在《宋元學案》自序中所說：「即如聖門，師商之論交，游夏之論教，何曾歸一？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錢先生對歷史認識的基本出發點便不是我所能完全同意的，而他的閱歷和所出也不是太多現代人所能把握的。然而，歷史的有趣不正是因為這種「隔」、這種多元的「殊」麼，所以我對他一直保持尊敬的「溫情」。

今年八月我離開了香港，回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教書。把過去近二十年中所寫的一些文章收集在一起，題為「讀史的樂趣」出版，這也算是具有紀念性質的一件事。在收集它們出版時，我深深感到我在台大及耶魯的老師們所給我的影響實在太多了。在思想史、社會史、世界向度的中國史及史學史方面深深影響我的有如（依時間順序）許倬雲、李亦園、方豪、瑞德（Arthur F. Wright）、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鮑瑪（Franklin L. Baumer）、凱佩德（Peter Gay）、田爾摩（Robert R. Palmer）及余英時等人。他們當中有的已經作古，但我懷念之情並不稍減，因此我就把這本書獻給他們。

在過去二十年中有很多朋友及學生幫助我思考及寫作，他們的貢獻在這些文章中處處可見。我現在無法一一向他們致謝，只能提到黃俊傑、麥勁生和潘希華三位。他們在友誼和知